

新兴的

美国国家商务部最新年度报告 →

数字中国研究院编译

数字经济



新兴的

美国国家商务部最新年度报告

数字中国研究院编译

沈志斌 / 郭志强 主译

数字经济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作者简介

阿尔诺·格鲁恩 1923 年 5 月 26 日生于柏林，1936 年流亡到美国。1958 年他成立了自己的心理治疗诊所。1961 年已是心理分析家并考取了博士学位，这期间他还一些大学和医院工作，在心理学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果。他的重要著作为：1984 年出版的《背叛自我：男人和女人对独立的恐惧》，1988 年的《过早的离去：对儿童突然死亡的解释》，1987 年的《常态下的癫狂》，1991 年的《错误的诸神》和 1997 的《丧失同情心》。

1979 年以来他居住在瑞士。

序

对这个世界上的恶，人们已经思考得很多，心理学也提出了说明人的破坏性的许多观点。但很少有人像阿尔诺·格鲁恩那样如此彻底的去揭示人的破坏性的原因。他指出了暴力和非人性是如何在人的内心生成以及我们的社会生活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那就是敌视生命的癫狂披上了符合现实的外衣。他打开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到人的破坏性不是简单的干坏事的能力，而是一种不为人所知的缺陷造成的后果，这种缺陷就是：在失去感知自己情感的能力以及这种能力被自我憎恨取代后，也就失去了发展真正的同情心和真实感受的能力。格鲁恩在《常态下的癫狂》一书中揭示了破坏性的

根源，这些根源常常是隐藏在所谓的对人类的好心或维护秩序的理智背后。格鲁恩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这些例子也包括了第三帝国或越南战争中发生的令人发指的事件。他提出的证据证明了如果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不统一，就不可能产生富有责任感的行动和真正的人性。

前　　言

我写这本书是希望我的经验和观察能帮助其他的人更好地面对自己的现实。这本书反映了我在研究常态下的癫狂这一过程中个人的和职业上的经历，这种癫狂是以爱的名义制造死亡和破坏。

当孩子开始失去自我意识时，也就开始了一种自我背叛的行为。这一过程的起端是孩子不再能直接地感觉父亲和母亲的感受，而是要依据父母看自己的方式。“适应”父母的权力要求导致了孩子心理结构的分裂。孩子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同他与周围环境的内部关联分开，这样就失去了行为和动机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孩子为了能参与要求他服从的权力，就要用听从和适应来取代对自己行为的负责。人一旦失去了同自己内心的关联，那他只能同一种虚假的自我发生关系。这种虚假的自我就是面子，这种面子是以周围环境赞同的行为方式和感情为基准。希望或必须维持这样的面子主宰了人的行为方式，这样人就失去了自己的感受、情感和同情心。而缺乏在自己身上扎根的能

力会产生破坏性和恶的行为方式。这本书要探讨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

我不是第一个研究人的破坏性的人。在所有的生命体中，人看上去是为了破坏而进行破坏的惟一生命，也就是芬兰心理分析学家马尔迪·西拉拉称之为的把破坏看作是自我目标。弗洛伊德或埃里希·弗罗姆认为人的这种破坏性不是源于一种先验存在的死亡本能，就是源于以肛门式的或俄狄浦斯式的不健全发展。而我认为已经找到的许多迹象表明，人之所以具有破坏性以及能够杀人的根源是人为了参与一种幻想出来的权力而做出的自我背叛。正因为这种自我背叛不是什么“更高”的命运，而是每个人或多或少自觉的服从所致，由此就会产生一种伴随一生的自我憎恨。这样一种发展之所以可怕是因为人只有通过破坏，才能感觉到自己是活着。

在第一章里我要探讨责任心的问题并把责任心同通常被当作衡量责任心的标准、义务和服从加以对照。从这点出发，我要说明一种癫狂现象的特点，这种说明有别于一般的心理学和精神病治疗学。一般的心理学和精神病治疗学的观察方式是局限在通过人同现实关联的程度来判断人的行为方式，这样做当然有其道理。只是这样的观察方式会阻碍我们接近一种更难把握和更可怕的病理学，隐蔽是这种病理学的方法之一：就是一种把自己掩盖起来，用精神健康的面具伪装自己的癫狂。这样做并不是很难，因为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欺骗和诡计是符合现实需求的。



那些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忍受失去人的价值的人被看作是“发疯”，而那些同人的本源分开的人却被视为是“正常”。我们把权力托付给后者，让他们来决定我们的生活和未来。我们相信这些人掌握了通往现实的正确道路并能正确地同这条路打交道。但一个人同“现实的联系”不是衡量一个人精神和身体健康的惟一标准，我们还必须问一下，在何等程度上人能产生或消除情感，如绝望的情感；能产生或消除知觉和体验，如对感受的知觉和对激动的体验呢？

第二章的内容是研究自我憎恨和自我憎恨的出发点：对自己参与和服从保持沉默这一基本谎言。如果人拒绝自我是因为自我会危及自己的权力地位，那么报复的感觉就会开始控制这个人的生命。人们坚持因为伤害了别人而应得到爱，而且伤害别人还常常会被看作是对别人的恩施（过去人们不是常常因为父母伤害了自己而仍然爱他们，理由是父母做的事都是为自己好），一个分裂的自我无法认清自己的服从和同谋，所以只能接受父母的说法并为这种说法辩护，那就是父母对自己的要求是出自于爱。在父母这样的“爱”和“关心”的名义下，控制他人的权力得到了巩固。

为了说明这方面的问题，我援引了第三帝国的例子，并不是因为纳粹是德国人，而是因为德国法西斯使我们看清了在任何地方一旦人同自己内心（内心世界、最本质的人性感受）分割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但第三帝国的

结束并没有取消出现这一帝国的前提。与过去一样，现在得到鼓励的不是人的本质而是外部的表现形式，受到赞扬的不是内心的独立性而是适应。今天这些前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以“人道”和“与人为善”的面貌出现。可怕的东西越来越经常地掩盖在微笑的表情底下，看上去就像是对他人特别爱护的友好举动。因此要认识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的病态是越来越难了。

在第三章里，我要研究崇拜死亡的问题，一个压迫了自己感受能力的人几乎必然会陷入这种狂热之中。我的出发点是人的发展可以朝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进行：一个是形成同外部世界结合的内心世界；另一个是在放弃自我内心的情况下让外部来控制自己。如果由外部控制的发展只知道服从和适应，而不知道什么是痛苦，那么破坏性的行为方式就是“自然的”最终结果。向内和向外发展的交叉口不仅说明了个人自我组织的两条不同的道路，而且还形成了两个完全对立的现实：权力的现实和爱的现实。

第四章要谈的内容是：事实上不是感情的感情。这一章让我们看到认同的问题，这种认同不是导致人自己的同一性，而是要避免同一性，这种现象的发生比我们感知的要多得多。

我在第五章里将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但是从反叛和适应的角度以及反叛和适应同暴力关系的角度。我提出的观点是：在发展成顺应者和发展成反叛者这两个过程之间有许多共同点，产生这些共同点的原因是同“坏”母亲的关

系。顺应者是把坏母亲辩护成“好”母亲，而反叛者努力要得到一个好母亲，但他的行为实际上是受到坏母亲的影响。

第六章说明了这一点对这个世界上掌握权力的男人起什么作用。我还分析了美国总统肯尼迪、尼克松和里根以及他们的外交政策。

在第七章里我试图更详细地描绘心理障碍类型，对我来说这种类型是精神分裂的对极，是常态下的癫狂的最强烈的体现。世界文学中的一个人物，也就是易卜生的培尔·金特最有启发性地体现了这种类型，这也许这会令一些读者感到意外。

在第八章里我集中地分析癫狂的两个矛盾的方向：作为生活形式的癫狂和反抗无法忍受的社会生活形式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癫狂。在我们的文明中，第一种疯狂被看作是“现实主义”，只有第二种疯狂被看作是病态。

我在《对自我的背叛》一书中已经触及到了这里提到的礁个问题。在这本书里我之所以又提到这些问题是为了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而不是重复。

也许读者会发现我常常援引文学中的例子。按照我的看法，文学和诗作比心理研究更接近人的真实。现在的心理研太以“现实”的神话为方向，太以权力结构的神话为方向。

但艺术家保留了通往人的要求和行为动机的通道。一个作家之所以写作，往往是因为要用他的创造性力量来对

抗“占主导地位的看法”。他所用的语言仍还是一种了解人的经验完整性的语言。

而科学则相反，正如米歇尔·波拉尼所指出的那样，是试图把“人的角度从我们的世界图像中消除，以便把我们引入荒诞”。所以，对我来说，在探讨这本书的观点时，作家们的例子无论是说明人的体验的完整性还是分裂性都是十分重要的。作家们的证据提供了说明一种癫狂的形象例子，这种癫狂是掩盖在健康的面具下，今天已经开始让人类越来越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

为了说明我看问题的角度和从经验上证明这一角度，有的时候我采用的例子看起来是人的行为方式的极端形式。有些人也许会认为这样的例子没有很多的说服力，因为这些人不是把人的行为方式的多样性看作是一种连续的统一体。但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是拒绝把我们大家连接在一起的各种纽带。他们这样做只是玩弄一个假逻辑的伎俩，这种伎俩是要把我们从正道上引开。把人的存在区别为范畴和学科的逻辑只是为了要增加我们对我们完整性的怀疑，是要使我们感觉到不安。但我们的完整性的基础是我们的感情和心灵告诉我们的东西。

心灵的语言来自于对爱和温暖的很深的要求，人们愿意给予和接受这样的爱和温暖。但我们的文明使我们胆怯，当我们感觉到自己有强烈感受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感到羞愧。“现实”的语言许诺要把我们从自己需求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正是这一点让我们不再相信自己的感

觉。所以我们惟一的拯救是心灵的语言。我们必须克服分裂，通过不再接受一个所谓的“现实”的逻辑，而是坚持自己有能力产生同感，有能力体验痛苦和快乐。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

我要感谢我的三位朋友，他们为了这本书提出了有益的想法并丰富了这本书的内容。他们中的两位是杰出的精神病治疗专家和心理分析学家瓦尔特·赫·雷西勒尔和马尔迪·西拉拉。第三位是阿尔纳·西拉拉，他是神学家和哲学家。这些朋友的思考和生命的完整性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和启发。这一点也适用于凯达诺·贝内德狄，他的人性为我们开辟了一条了解精神分裂的道路，他的慷慨给予我很大的支持。汉斯·克里格尔通过他个人的努力，帮助我更清楚和更正确地明确了思路。我也感谢我的编辑乌里克·布尔格尔·古德文女士，她的热情和理解帮助我实现了写这本书的愿望。

本书翻译人员：

主译：沈志斌、郭志强

新兴的数字经济

**译者：沈志斌、马欣、杨雪梅、
张敏文、周海清**

新经济指数

**译者：郭志强、修洁、张玲、韩艺、
王惠敏、安娜、肖红**

硅谷時代 丛书

《硅谷时代》

《新兴的数字经济》

《知本家风暴》

责任编辑 / 黄志平

封面设计 / 张朋 曹向晖

目 录

序	1
前 言	3
第一章 以现实的名义拒绝现实	1
第二章 作为人的破坏性根源的自我憎恨	28
一、论义务意识	31
二、同一性、自我憎恨和犯罪	38
第三章 对死亡的秘密崇拜	46
第四章 不是感情的感情	69
一、意想不到的罪犯	69
二、心安理得的凶手	75
三、公务化的暴力	81
四、维持谎言的暴力	86
第五章 适应、反叛和暴力	100
一、男性的神话和女性的自我价值	102
二、好母亲和坏母亲	106
三、适应者的小伎俩	107
四、对一个右翼恐怖分子的内心观察	111
五、战争和反叛	115
六、反叛者与顺应者	118

七、“不受意识形态支配”的暴力	131
八、虐待狂和反叛	142
第六章 体现内心空虚的当权者的强权政策	146
第七章 心理变态者和培尔·金特	172
第八章 作为生活方式和抗议的癫狂	202

第一章

以现实的名义拒绝现实

对自己的成长承担责任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过程。那些按照时间顺序的简单概念进行思考的人，永远不会把握影响这一过程的各种因素。不能想象人的发展不受外部的影响。我们大家都有父母，都有在我们内心继续起作用的父亲或母亲。但是在人的灵魂深处产生的矛盾有其自己的动力。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举动：这些举动看起来是由一定的外部事件所决定，但事实上同这些事件很少或根本就没有关系。

因为不仅是外部环境影响到渴望成长的小小的自我。孩子对重要的外部影响的反应也会对环境起反作用。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相互的作用。父亲和母亲可能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孩子身上，但孩子的反应也会决定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和强度。

孩子和父母之间的这种相互游戏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要求独立的可能性是以正在成长的自我和它的环境之间最早的关系为基础，另一方面这种可能性也对孩子在何等程度上能承担起实现自我的责任起关键的作用。孩子将来在社会范围的所有关系都取决于这点。原则上责任心可以